

[Translation Studies]

Exploration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Going Glob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MENG Jiarong XIN Hongju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1, 2022

Accepted: October 1,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MENG Jiarong & XIN Hongjuan. (2022). Exploration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Going Glob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67–07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9](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9).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9>. p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Zhejiang’s re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of Graduate School of Ningbo University (No. IF2022055).

Abstract: Red culture embodies CP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y of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progress. To tell the red in an appropriate way may gi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a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Being the cradle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thoughts, Zhejiang has a rich variety of red cultures deep-rooted in its history. Together with its traditional thoughts, Zhejiang Red Culture has well shaped the present-day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people and has set a very good example of China’s reform and progress in the modern era. Based on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going global,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make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oth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red culture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elin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words: Zhejiang Red Culture; going global;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MENG Jiarong is a postgraduate at Ningbo University. Her email is 1742778256@qq.com; XIN Hongjuan is a professor at Ningbo University. Her email is xinhongjuan@126.com.

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進路探究：翻譯傳播學視角

孟佳蓉 辛紅娟

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紅色文化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奮鬥進取的歷史，對外講好紅色故事有利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制度有全面、客觀的認識。浙江紅色文化作為地域紅色文化的典型代表，探究其國際傳播路徑有利於浙江紅色形象在世界舞臺的塑造。本文借助翻譯傳播學的理論指導，回溯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過程中存在的諸多不足，探究未來傳播進路，以期為提升地方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力做智識上的推動。

關鍵詞：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翻譯傳播學

基金專案：寧波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資助專案「翻譯傳播學視域下浙江紅色文化『走出去』路徑探究」(專案號:IF2022055)。

引言

近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工作，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新時代重要使命之一。紅色文化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奮鬥進取的歷史，對外講好紅色故事有利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制度有全面、客觀的認識。浙江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融入全球化程度較深，經濟、政策優勢明顯，具備良好的紅色文化傳播條件。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在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浙江省的核心任務是打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省域範例，生動展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①，這也是浙江進行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重要目標。紅色文化國際傳播主要涉及語言翻譯和傳播實踐兩大層面。翻譯傳播學理論作為新興交叉學科的指導理論，立足文化對外譯介，通過對國際傳播的各個要素和環節深入考察，為國際傳播的具體實施提供借鑒。因此，運用翻譯傳播學理論剖析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實踐的過程，探究進路，具有理論適切性。

一、翻譯傳播學的啟迪

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翻譯傳播學並非翻譯學和傳播學的簡單疊加。呂俊曾指出翻譯學是傳播學的一個特殊領域，他還認為「在納入傳播學領域之後仍需注意翻譯學所具有的特殊性」，翻譯學和傳播學都視傳播為資訊處理目標，但傳播學研究針對同語文化環境，翻譯學研究則針對異語文化環境(呂俊, 1997: 44)。這說明在針對異語文化環境的國際傳播過程中，單純運用傳播學理論或翻譯學理論不能滿足當下中華文化對外譯介的需求，這也是翻譯傳播學應運而生的一大原因。準確把握翻譯傳播學的前提是深刻認識翻譯傳播學的本質。尹飛舟和餘承法基於前人研究，將翻譯傳播學定義為「研究翻譯傳播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是闡釋人類使用不同語言符號進行資訊傳遞與交流的知識系統」(尹飛舟、餘承法, 2020: 170-176)。正如尹



飛舟所說,「翻譯學把作品的傳播視為譯後行為,傳播學則忽視語言轉換環節,而翻譯傳播學則把翻譯傳播視為一個整體的傳播活動」(龐慧燕,2020:142)。翻譯傳播學的出現為翻譯學和傳播學之間的雙向互動進一步提供了理論支持,有效彌補了翻譯學研究傳播著力不足和傳播學研究語言運用不足的兩大問題。在豐富和拓展翻譯傳播過程研究的基礎上,翻譯傳播學對指導和優化當前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路徑有重要意義。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認識到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既不是簡單的雙語或多語翻譯,也不是「一廂情願」的單語傳播,也即在進行國際傳播時,應綜合考慮語言、意識形態、社會傳播環境等諸多影響因素。翻譯傳播學理論認為,主體、客體、譯者、媒介、受體和效果六大要素在翻譯傳播過程中緊密相連,發揮著重要作用。浙江紅色文化翻譯傳播的主體即是傳播發起者,客體則指向浙江紅色文化的傳播素材,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如:革命旅遊地、紅色人物事蹟、紅船精神等。翻譯傳播主體基於對傳播活動的預判和以往傳播經驗的總結,選擇現有傳播素材設置議程,並聘用譯者進行翻譯,再運用數位技術手段,通過不同媒介、媒體向國外受眾傳播相關內容,受眾接收到浙江紅色文化內容後形成受眾回饋,根據回饋,翻譯傳播主體再次進行議程設置,推動傳播的迴圈進行。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各要素之間環環相扣,只有打造一條完整的閉環翻譯傳播鏈,浙江紅色文化才能夠實現可持續迴圈傳播,達到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浙江紅色形象目的。

二、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過程回溯

根據翻譯傳播學理論,翻譯傳播過程包括發起、翻譯、傳輸和接收四個階段。在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過程中,發起階段以主體為中心,這一主體可以是有關部門、社會組織、甚至是傳播個體;翻譯階段以譯者為中心;傳輸階段以媒介為中心,媒介形式表現多樣、管道各不相同;接收階段以受體為中心,利用受體回饋可以檢驗翻譯傳播的效果,各個過程之間互相作用、互相影響。

良好的翻譯傳播定位能夠推動紅色文化的精準傳播,減少零散化傳播現象的發生。在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發起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做好頂層設計。對紅色文化整個翻譯傳播過程進行全域考量,詳細部署傳播方略,能夠縮短國際傳播週期,避免出現國際傳播疲軟乏力的現象。因紅色文化本身具有科學性和嚴肅性,在對外傳播紅色文化時,容易出現故事性不強、表現力不夠的問題,所以在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發起階段,應進一步加強對國外受眾紅色文化的接受度的考量,樹立明確的傳播目的和傳播物件,有針對性地進行傳播。做好發起階段的前期準備工作是浙江紅色文化走出國門的第一步,做好這一步需要以結果為導向,設計科學、合理的紅色文化國際傳播方案,為國際傳播的後續進行奠定良好的基礎。

浙江省紅色資源豐富,共有國家級紅色旅遊景區 10 處^②,浙江省檔案網館藏資源《浙江革命烈士英名錄》14057 條記錄^③,傳播素材豐富、形式多樣,這為紅色文化國際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但是檢索國外各大媒體平臺可以發現浙江紅色人物、文獻、視頻等資源外語版本的數量還不能與中文版本數量相媲美,如:浙江省慶祝建黨百年重點宣傳專案——《紅船領航——百年浙江潮》等優質紅色資源尚未出版雙語或多語翻譯。而紅色旅遊景點的外文宣介翻譯還存在語法、拼寫、概念解析錯誤等問題,如:「紅色根脈」、「紅色基因」、「紅色足跡」、「紅色經典書籍」等片語中對於「紅色」的翻譯缺乏變通意識,可以根據不同的語境,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盡可能在翻譯階段減少國際友人的解讀困難。翻譯是幫助國外受眾瞭解浙江紅色文化的重要手段,提升傳播資源的翻譯數量能夠增加紅色文化在國際傳播場域中的受眾觸達率,翻譯的品質則決定了國際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在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翻譯階段,做好翻譯工作有利於彌合語言障礙,保證傳播的順利進行。

傳播素材製作完成、對應翻譯版本審定完成後,在傳輸階段,創新紅色文化對外傳輸的形式、拓寬可利用管道有利於全力推進紅色文化國際傳播不斷深入國外受眾群體。目前,浙江海外傳播媒體平臺,如:浙江



國際頻道,下設《黃金時間》《華人天地》《發現時間》《今日浙江》四個子頻道,但是其中大部分英文視頻都缺少對應雙語字幕,一些中文視頻也沒有外語同步轉播,對平臺傳播的利用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除此之外,印象浙江英文網除新聞(NEWS)板塊外,其他板塊視頻文章更新疲軟,很多還停留在2021年,難以充分滿足互聯網時代讀者和聽眾對信息量和發佈速度的需求和期待。國際發佈內容更新頻率高有利於不斷抓取國外受眾的關注,形成用戶黏性,為浙江紅色文化的國際傳播培養一批潛在的穩定讀者和觀眾。總之,擦亮浙江紅色文化的國際名片,需要國際傳播從業人員,在製作傳播物料時全域考量,納入國際視野,時刻注意凸顯「國際傳播」的「國際」二字,做好在世界舞臺進行廣泛傳播的準備。

在經歷發起、翻譯和傳輸三個階段後,接收階段更多側重於對翻譯傳播效果的檢驗。結合對傳播效果的評估,總結紅色文化現有國際傳播案例是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在接收階段的重中之重。面對不同的傳播個案,既要注重總結國外受眾群體的普遍習慣偏好,也要注重特殊性,對傳播對象進行精細化分類,為針對性傳播做足準備。就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現狀來看,國際傳播案例總結還有很大深入空間,通過經驗教訓的總結優化國際傳播各個階段的傳播措施是浙江紅色文化得以不斷傳播的動力來源,勢在必行。

通過對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過程的剖析,可以發現國際傳播的發起階段,重點落在優化頂層設計;在翻譯階段,翻譯數量和翻譯品質的提高需同步進行;在傳輸階段,挖掘多方媒介管道,打造全媒矩陣是關鍵舉措;接收階段則要重視總結歸納,根據相關經驗教訓,及時調整下一輪國際傳播方案。

三、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障礙剖析

結合翻譯傳播學理論和上述國際傳播過程反思,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主要面臨制度障礙、文化障礙、情感障礙和語言障礙四大障礙。「制度障礙包括輿論環境、意識形態、法律法規等;文化障礙包括信仰、習俗、教育等;情感障礙包括興趣、喜好、愛憎等態度」(尹飛舟、餘承法,2020:174),語言障礙則指向雙語或多語翻譯障礙,既有不同語言形式上的差異,也有思維上的差異。

制度障礙的根源是意識形態難以彌合。「在當下的多元文化語境下,由於歷史和文化塑造的知識和信仰千差萬別,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無處不在」(胡安江,2020:45)。紅色文化生長於革命年代,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奮鬥進取的反映,因此在國際傳播領域常常被認為有政治偏向,遭到誤讀誤解,甚至是惡意闡釋,導致國外受眾對紅色文化長期以來都持有一定的偏見。很多國外網路平臺甚至直接對含有「紅色文化」元素的視頻採取限流、自動刪除等措施,導致紅色文化根本沒有進入世界文化場域的機會。制度障礙的存在導致浙江紅色文化在國際傳播過程中面臨消極負面的輿論環境。

文化障礙的根源是思維差異,思維的差異進一步加劇偏見歧視的積累。「西方思維模式中的概念本質論和抽象邏輯論導致了兩個鮮明的文化特點出現:一是其文化體系的排他性;二是其脫離實際性」(劉建軍,2021:12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崛起,不斷在世界大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用實際行動展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贏得了周邊國家的讚賞。這觸發了一些國家的危機感,導致這些國家文化體系上的排他性日漸強烈,企圖從各方面切斷中國文化「走進來」。特別是對紅色文化消極的固化思維,更加劇了某些國家的焦慮感,以歪曲事實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阻礙自己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紅色文化形成全面、客觀地理解。文化障礙的存在導致國外受眾始終無法以交流的心態主動接受浙江紅色文化的傳入。

情感障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文化障礙的副產品,「文化是導致感知不一致的主要因素,……多文化的背景,因其獨有的特點,通常是以缺乏信任為特徵的一種傳意交流」(拉裡·A·薩姆瓦等,1988:256-257)。信任感的缺失實質上是情感障礙的最大成因。由於缺乏對紅色文化的信任,再加之上述制度、文化障礙的存在,導致國外受眾對紅色文化的戒備心非常強,難以真正以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面對紅色文化的

傳入。情感障礙的存在導致浙江紅色文化在國外受眾群體間的共情基礎弱、底子薄，紅色故事的價值點難以得到激發。

語言障礙主要由翻譯品質欠缺和翻譯效能發揮不強造成。外語翻譯是國際傳播的重要決定性要素。浙江紅色文化本身內涵豐富，彙集浙江革命史、紅色精神、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知識，對翻譯的要求很高。不僅需要譯者擁有扎實的翻譯能力，還需要有話語轉換能力。但是浙江當前尚未吸納充足的紅色翻譯傳播人才，還處於邊嘗試傳播邊努力培養的階段，這也是語言障礙無法在短期內跨越的重要原因。作為國際傳播的橋樑，不提高翻譯品質，不跨越語言障礙，浙江紅色文化始終無法真正深入國際、走向世界。

在浙江紅色文化的各個國際傳播過程中，制度、文化、情感和語言四大障礙貫穿始終。面對當前紅色文化對外傳播需求大於國外瞭解需求的客觀事實，想要減小這四大障礙帶來的傳播阻力，減少國外受眾對浙江「強勢輸出紅色文化」的誤解與排斥，就需要建立以國外受體為核心的翻譯傳播機制，不斷調整翻譯傳播的方式方法，向國外受眾準確傳達，浙江省「進行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目的是進行文化交流，促進世界文化的繁榮」的傳播目的。

四、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路徑

把握國際傳播的內在規律，順勢而為進行國際傳播活動，形成「一次製作、多次發佈、迴圈傳播」的可持續翻譯傳播模式是當前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理想模式。依據前文對浙江省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過程的剖析和面臨障礙的分析，浙江在後續的國際傳播中可以從再語境化敘事、翻譯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拓寬傳播平臺、形成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機制等方面出發提升浙江紅色文化在世界場域的傳播力。

（一）依託大眾話語實現紅色故事的再語境化

「科學話語的大眾化是一個由大量話語符號實踐組成的關於交際和資訊的社會過程，其目的是將學者的科學知識、觀點和意識形態以非專業的形式傳播給普通大眾，使其從根本上瞭解科學的本質，並塑造科學思想。」(Calsamiglia & Dijk, 2004: 371) 這種將抽象性知識轉化為另一文化場域下的話語，即再語境化的過程。再語境化過程並不是簡單地將抽象知識照搬進另一文化場域，而是需要根據受眾特點、場域性質等進行重構，實現傳播效果最大化。在紅色文化國際傳播過程中，應轉變「我要告訴國外受眾什麼」的舊思路，更多考慮「國外受眾缺什麼」、「國外受眾想聽什麼」、「紅色文化能給國外受眾帶去什麼」等問題。從這些角度出發進行議程設置才能真正去除紅色文化傳播舊模式中所謂的「說教感」。以茶文化為例，茶文化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特色之一，在國外是一種相對稀缺的文化，國外受眾對茶文化也保有好奇心，我們就可以結合茶文化，講述紅色故事。

浙江安吉的脫貧故事就是茶文化與紅色文化相結合的一份生動傳播素材。在黨和政府的帶領下，浙江安吉依託茶業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2005年，習近平總書記還在安吉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作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發源地，從貧困落後到如今人人都能過上幸福生活，浙江安吉的紅色故事既有脫貧經驗的傳授，也有生態保護理念的外化，更有黨和政府對地區發展管理的實踐表現，內涵豐富。對此類層次豐富的紅色故事進行國際傳播可以更多考慮進行雙線、甚至多線傳播，借助其他地域文化「潤物細無聲」地講述紅色故事。此外，還要認識到像這類脫貧故事的講述除了要講清楚故事發生的始末，從貧困到富裕的轉變過程，還要更多注重如何展現其世界影響力，包括致富經驗、旅遊開發思路等為國外受眾帶去的益處等。要充分發揮此類紅色故事的外延意義對國外受眾群體的稀缺效應。致富經驗這類關係一國人民福祉的議題不僅會是國外普通大眾關注的重點，更可能成為各國領導人重點關注的內



容,當一個國家從上至下都能體會到浙江紅色文化、中國紅色文化能給自己國家帶來的好處時,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制度障礙、情感障礙自然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破除。挖掘浙江各市、縣的紅色歷史,借助再語境化敘事,是為了講述國外受眾能聽懂的故事,把科學、抽象的紅色文化概念以一種具體的、可感的方式進行通俗化解讀;而結合浙江獨有的其他地方文化進行複合式傳播則是為了放大稀缺效應,不斷加深國外受眾記憶點,塑造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品牌。

(二)「以我為主」提升紅色話語交際效果

如今選擇翻譯方式和進行話語轉換是當前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在語言翻譯方面面臨的兩大挑戰。「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著的兩個特殊現象或稱事實有關,那就是「時間差」(time gap)和「語言差」(language gap)」(謝天振,2020: 22)。相比於中國對西方的瞭解,西方人對中國缺少比較全面和深入的瞭解,同時,漢語的難度和紅色文化的深刻內涵使我們不能期待國外普通大眾對浙江紅色文化有較為準確的前期瞭解,因此在國際傳播過程中需要將受眾的接受度納入考量,對翻譯材料做出編譯、變譯或全譯等選擇。此外,我們也應認識到「翻譯品質在於交際過程的效果」(Gouadec, 2007: 6),特別是在國際傳播場景中,交際效果的好壞最能說明翻譯品質的好壞。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目的即是讓國際社會能夠對浙江紅色形象、紅色歷史有更多客觀的認識,減少國外受眾對紅色文化的敵對心理,通過文化交流促進認同感的形成。因此,無論是翻譯技巧的運用,還是方式的選擇,都要考慮如何做好話語轉換、更好達成交際目的。

話語轉換對譯者要求高,需要進行長期的培養和訓練,紅色文化翻譯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是新時代浙江推動紅色文化「走出去」的必然之舉。「譯者對自身和所處文化環境的理解是影響其翻譯的重要因素」(Lefevere, 1992: 14),政治素養高、身份立場明確的譯者能夠確保紅色文化翻譯的準確性、客觀性和嚴肅性,避免在傳播過程中出現重大錯誤,導致中西矛盾加深的情況出現。進行人才培養時著力提升其翻譯能力是一方面,除此之外還不能忽視政治知識的教授,可以通過對紅色翻譯預備軍時時考核的方式以考促學。同時,還可以適當對譯員進行電腦輔助翻譯工具使用的訓練,提高翻譯人才的工具使用能力,提升翻譯效率。此外,我們還要認識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接受外來文化主要都是通過他們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翻譯家的翻譯來接受外國文學和外國文化的,這是文學、文化跨語言、跨國界譯介的一條基本規律」(謝天振, 2020: 15)。浙江在進行隊伍建設時,要有意識吸納外籍傳播人士,以便對國外受眾的閱讀、收看喜好有更深的瞭解,選擇合適、恰當的翻譯策略,使翻譯效果最大化。翻譯是國際傳播中的關鍵一環,是打通文化傳播內外的橋樑。提升翻譯品質能夠幫助國外受眾更好理解浙江紅色文化,減小因語言障礙造成的傳播阻力。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本質上是對紅色文化翻譯傳播的長遠規劃,為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保證翻譯傳播的持續進行。

(三)暢通傳播管道用好微小敘事

資訊化時代,積極構建政府主導,媒體、企業和個人多方參與的傳播提議有利於放大傳播效益。目前浙江海外傳播自有平臺有:浙江國際頻道、中國浙江、印象浙江英文網等,中央媒體平臺有CGTN、新華網、央視頻、國際線上等,此類政府管理下的發聲管道應堅定自身的權威地位,直接、客觀地傳播紅色文化知識,正面回應相關紅色文化問題,將紅色文化在海外的定義權牢牢掌握在浙江人自己手中。而針對圖書等文獻出版,浙江應充分尋找與海外出版社,特別是知名出版社交流與合作的機會。享有一定聲望的海外出版機構本身就享有一批忠實的讀者群體,減小國外受眾對浙江紅色文化的心理戒備,破除紅色文化國際傳播中的「信任危機」,擴大紅色文獻資料的海外閱讀群體規模。受眾群體的基數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對浙江紅色文化關注度提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當前大眾傳媒因其「親民」的特點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擴散需要傳播的內容,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接地氣」的傳播方式如果控制不當,會造成娛樂化傾向。紅色文化有別於其他大眾文化,其內在天然的政治基因需要保證絕對的正當性和一定的嚴肅性,因此必須設立把關人監測翻譯傳播的傳輸狀況,提前做好突發輿情的應急準備,可以成立相關部門專門對紅色文化的國際傳播全過程進行記錄和監督,即時回饋,摸清國際傳播的內在規律和隱形傳播機制,暢通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管道。總之,各個媒體平臺和各方管道都應充分發揮自身文化優勢、開拓相關市場,利用和開發先進技術,主動為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例如,可以生產與紅色文化有關的文創物品、在海外舉辦讀書會等活動,近距離與國外受眾交流對話。在紅色文化進行由內向外傳播的過程中,無論是平臺建設,還是監督管理的實施,只有做好打「持久傳播戰」的準備,保持耐心和毅力,才能不斷突破浙江紅色文化在傳播中遇到的重重障礙,最終迎來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春天。

(四) 聚焦接受場域開展傳播效果評估

資訊到達受眾後,受眾在認知、情感、態度和行為各層面會產生一系列反應(董璐,2008:23)。面對翻譯傳播內容,受眾會產生認知,也可簡單理解為受眾對內容的第一印象,在認知之後,受眾會對譯作做出情感反應並形成回饋。如,被傳播者會寫書評,發表相關言論等(Chesterman,2007:179-180)。浙江紅色文化飽含浙江特色,受眾的回饋對浙江在世界舞臺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影響意義。因此,接收階段必須對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是否激發了良好的受眾回饋進行檢驗,檢驗的方式包括:利用調查問卷、深度訪談等對紅色文獻出版物的銷量、圖書借閱量、視頻播放量、紅色文化認同度等進行多維考察等。在得出考察結果之後,還要對調查物件進行精細劃分,分析不同年齡段國外受眾的不同習慣偏好,形成有關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受眾興趣偏好、關切焦點等關鍵資訊資料庫,依據這些關鍵資訊撰寫分析報告,報告內容具體可包括,該輪國際傳播的素材選擇是否恰當、是否真正具備國際傳播價值,素材翻譯有誤造成誤解,傳輸階段哪一管道存在滯脹的情況、面對同一素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反映的不同等問題,為下一輪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再次發起提供借鑒。

在經過多次的經驗總結後,要有意識打造浙江有關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受眾群體的紅色文化個性化傳播方案。並且,通過借鑒國際上相關傳播效果評估體系的設置方法,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傳播效果評估體系,分設不同層級的評價指標,對各類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案例進行有效評估,不斷優化紅色文化國際傳播方案,助力紅色文化的深入傳播。

結語

當今時代,「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浙江氣派的對外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通過講好浙江故事,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與認同,在推進國際傳播中做出浙江貢獻」是浙江省新的使命與責任(袁家軍,2021:6-7)。浙江進行紅色文化國際傳播不僅有利於塑造自身紅色文化形象,其價值還在於,通過「浙江之窗」,引導世界各國人民以一種與時俱進的態度客觀看待中國紅色文化,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地區進行文化交流互鑒奠定基礎。借助翻譯傳播學理論對浙江省紅色文化國際傳播各個要素、各個過程和傳播障礙的剖析,我們認識到應將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著力點落在品牌塑造、人才培養、隊伍建設以及平臺開發和管理等方面。浙江紅色文化國際傳播路徑探究的最終目的在於形成紅色文化國際傳播的「浙江樣本」,為全國各地紅色文化「走出去」提供參考和借鑒,助力中國紅色形象在世界場域的構建。

注釋

- ① 袁家軍:《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在高品質發展中奮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在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澎湃新聞》,2022年6月2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8756732,材料使用時間:2022年6月30日。
- 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印發全國紅色旅遊景經典景區名錄的通知》,2016年12月30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612/t20161230_962839.html?code=&state=123,材料使用時間:2022年6月30日。
- ③ 浙江檔案:浙江革命烈士英名錄。<http://data.zjda.gov.cn/col/col266/index.html>,材料使用時間:2022年6月30日。

參考文獻

- Calsamiglia, H. & Dijk, Teun A. van. (2004). Popularization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genome. *Discourse & society*, 15(4), p369-389.
- Chesterman, A. (2007). Bridge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sociology. In M. Wolf & 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ouadec, D. (2007).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Routledge.
- 董璐:《傳播學核心理論與概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 胡安江:《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的譯介與傳播研究》,《中國翻譯》,2020年第2期,頁44-51+188。
- 劉建軍:《思維方式差異與中西文化的不同特性》,《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頁117-128。
- 呂俊:《翻譯學——傳播學的一個特殊領域》,《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頁40-45。
- 龐慧燕:《以翻譯為橋溝通四海萬邦》,《中國報道》2020年第Z2期,頁142-143。
- 拉裡·A·薩姆瓦等(著)陳南、龔光明(譯):《跨文化傳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
- 謝天振:《譯入與譯出:謝天振學術論文暨序跋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
- 尹飛舟、餘承法:《翻譯傳播學論綱》,《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頁170-176。
- 袁家軍:《爭當學習貫徹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排頭兵 以守好「紅色根脈」的自覺做好浙江外事工作》,《當代世界》,2021年第12期,頁4-9。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